

刊叢實現與論理

輯三第

編主遠志沈

馬克思主義不朽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近代思想發展概觀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年 歷史和理論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

馬克思主義與科學

新民主主義底歷史認識

論新民主主義經濟諸問題

胡繩

劉思德 譯著

沈希方 譯著

馬恩 譯著

徐賓 譯著

侯外廬

沈志遠

行印社版出中新港香
印翻局書國中

馬克思主義百年紀念



理論與現實叢刊 第三輯

馬克思主義百年紀念特輯

馬克思主義不朽……………編者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近代思想發展概觀……………胡繩

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劉思慕譯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沈希方譯

馬克思主義與科學……………英康福特譯

馬克思主義與科學……………徐納堅譯

新民主主義特輯

新民主主義底歷史認識……………侯外廬

論新民主主義經濟諸問題……………沈志遠

BW7484/03



馬克思主義百年紀念特輯

馬克思主義不朽

編者

「共產黨宣言」——全人類歷史中一個最偉大的不朽文件，自其出版迄今，已經滿了一百週年了。這一百年來，世界歷史所發生的變化是何等巨大而豐富啊。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所面對着的現實世界，自其基本特徵和趨勢上看，完全是一百年前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所預見到了的。一百年的世界史，嚴格說來，不啻替這一偉大的不朽文件提供了實證而已。

首先，「宣言」開始第一句說：「一個怪物徘徊在歐洲——這就是共產主義這怪物。舊歐洲的一切力量已經結成了神聖的同盟來對付這個怪物；主教和沙皇，美特涅和基佐，法國急進派和德意志的警察們。」一百年後的今天，這個「怪物」，已經早就不僅徘徊在歐洲，而是徘徊在全世界的一個角落了。聯合起來對這個「怪物」進行「十字軍征討」的，也已經不光是舊歐洲的一切反動力量，而是整個舊世界的一切時代渣滓了：羅馬教皇和日本天皇，杜魯門和蔣介石，邱吉爾和勃魯姆，如斯多里和鑾披汶，英國勞工黨和美國的共和與民主黨。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的德文版序文中強調着道：

「廿五年來環境的變化雖然很大，可是『宣言』裡所發源的一般的根本原理，直到今天依然全部正確」。七十五年前寫的「直到今天依然全部正確」這句話，在今天看來，也還是「依然全部正確」的。而且我們相信，它將如日月經天，永垂不朽。蒲伯納在兩次大戰期間曾說過一句饒有趣味的話，他說共產黨是一切政黨中最保守的一個，因為別的政黨都在二十世紀或甚至一九一八年以後才製定或修訂了它們的綱領，共產黨却至今仍堅持着他們的一八四八年的綱領。

不錯，在這一點上確實可說共產黨是最「保守」的政黨。但是這樣的「保守」，對於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對於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大眾，不僅是十分珍貴，而且還值得大書特書的。因為共產黨的這種「保守性」，正是證明他們的始祖之壓倒一切的科學預見的遠大性與永久性，同時也足證明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共產黨，能够始終一貫地為他們的理想信念，為他們的基本綱領，不顧一切地奮鬥到底；在自己的理想和基本綱領未實現以前，他們的奮鬥意志和鬥爭的堅定性是千百倍於別的。這和其他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的投機取巧、搖擺不定或者把自己的政綱完全當

作個人的「半頭」來利用的，絕對不能同日而語。

可是這絲毫也不等於說，共產黨的綱領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乃至在任何場合都是一成不變，到處永遠一模一樣，有如聖經教條一般。說「直到今天依然全部正確」，『將如日月經天，永垂不朽』云云，只是指的「宣言」裡所提供的基本的原理原則，無階級的科學的世界觀，「宣言」對資本主義這一「最後的矛盾社會形態」之必歸崩潰的預見與無產階級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鬥爭目標和戰略策略等，而並不是指它的一字一句或某一個別的論點。

在前引序文中接看這樣寫道：

「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應用，正如『宣言』本身所陳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要看現存的歷史條件而定的」。

「宣言」中也強調工人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是國際性的，因為資本主義剝削的一般性質是到處一樣的。但是「宣言」又特別警告人們，別企圖在國際主義的幌子之下，把一套現成的公式應用到革命實踐的各種具體場合上去。依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及列寧和斯大林的意見，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不能不在民族的形式之內進行著，而這種鬥爭的形式則決定於具體的歷史條件；民族的傳統和民族特點是這些歷史條件中的重要因素。

因此，「共產黨宣言」中所開發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雖將永垂不朽，但它的內容勢必隨着時代歷史條件之演變而不斷發展，不斷豐富的。做一個革命的馬列主義者，必須學會根據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區的歷史發展和革命鬥爭的具體客觀條件，來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發展它，豐富它。爲着這，對於一個革命的戰士，重要的不是熟背字句，而是緊緊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實質、精神和方法。在世界範圍上，善於根據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客觀歷史要求以發展與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是列寧和斯大林。列寧二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即基本原理）靈活地應用於俄國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而得到了巨大無比的收穫——領導了一億七千萬人從資本封建壓榨之下獲得解放，勝利地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也就是說，把「共產黨宣言」所宣佈的一切基本奮鬥目標，都一一變成了活生生的事實。

在中國領土內，善於根據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客觀歷史要求以發展與豐富馬列主義的，無疑是毛澤東。毛氏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靈活地應用於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實踐，同樣地也已獲得了顯赫的成就——領導了四億五千萬人民正在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國勝利。

世界歷史已經隨着反法西斯大戰的勝利結束，社會主義蘇聯影響的空前增強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東南歐和遠東的勝利發展而進入一嶄新的階段，這就是馬列主義開始全世界性勝利的階段。

「共產黨宣言」永生！馬克思主義不朽！

馬克思主義與

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發展概觀

胡繩

- 一 太平天國的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

二 對地主階級的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

1. 洋務思想與改良思想

2. 甲午戰前的改良主義思想

3. 戊戌維新運動
- 三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思想

1. 從改良主義中分化出了革命主義

2. 「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歧異」

3. 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混亂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後七十年，中國才開始有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僅僅由於外譯作用而產生的麼？——如果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思想不會必須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期才開始在中國成長；如果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出現於中國也不會具有那樣重大的劃時期的意義，不會在近三十年的中國社會思想發展中成為領導的力量，成為壯闊的主流。

從鴉片戰爭以後直到現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想史應劃

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七十年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時期，後三十年是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時期。

正當馬克思恩格斯建立他們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時侯，封建中國，開始蛻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現代歷史。但是當時的中國社會還遠沒有到達能够接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條件。七十多年間，隨着社會政治實踐的激烈波動，社會思想也經歷了複雜多樣的變化。有太平天國的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有從官僚統治者的「洋務」運動中分化出來的改良主義思想，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革命

思想。它們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起着把中國社會向前推進的力量，但實踐證明，牠們無一能解決現代中國的問題，無一能滿足廣大人民的需要。

這七十多年間的中國社會思想的波動恰恰可以證明，中國問題的解決不能不有待於無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出現。當現實的條件具備了，也就是，無階級開始要成爲一獨立的社會力量的時候，馬克思主義思想就不能不在中國出現。牠的出現就不能不是具有着結束前七十年的社會思想的波動的意義，就不能不擔負起中國社會思想向前發展中的領導的和主流的作用。

一 太平天國的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

百年前，當西方資本主義的大砲和商品衝破封建中國的藩籬時，在中國人的思想中，不可避免的開始引起了波動。

但作爲封建時代的文化思想的傳統承繼者的地主階級完全沒有能力來迎接這歷史的變動。鴉片戰爭的震撼只不過引起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對西方國家的堅甲利兵的羨慕和對環球輿地的初步認識。

在思想上一迎接了新時代的大變動的却是被以爲「無文化」的被壓迫的農民階級。

太平天國農民大運動的思想上的領袖洪秀全是在鴉片

戰爭中受着激烈變動的廣東孕育起他的革命思想來的。馬克思曾說，「鴉片（對於中國人民）不會發生催眠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這是很矛盾的」。同樣的，傳教士跟着鴉片販子而到了中國，但這種精神麻醉劑却成了中國農民大衆中革命思想的觸媒。洪秀全在鴉片戰爭結束後一年（一八四三年）仔細讀了一部基督教義的粗糙的宣傳品，以此爲基礎，他竟構成了一套思想，集中地表現出在封建壓迫下的農民大衆求解放的朦朧希望。

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和他的最初合作者在廣西開始其組織貧苦農民的工作。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時，在中國却還只有農民的素樸的社會思想在起着革命的酵素作用。洪秀全在一八四五——四六年間所寫的「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是這種思想的結晶品。「覺世訓」中開宗明義提出「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的總綱領。「醒世訓」中更給以闡明說：

「遇烈虐處三代之世，天下有無賴性，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異途，舉世尚德。美善相傳，何分此土彼土？禹稷憂餓，何分此民彼民？湯武伐桀除殘，何分此國彼國？孔孟殆車煩馬，何分此郭彼郭？蓋實見天下凡間，分有之則有異國，統有之則實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間大與之父也。近而中國，是皇上帝主宰化理，遠而各國亦然。廣而各國，是皇上帝生養保祐，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

人，這是兄弟之愛。天下多女人，這是姊妹之愛。何得存此種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併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今得何望哉？然而亂賊則治，暗蔽則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升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束縛，循行上帝之真道，時蒙天威，力遵天誡，相與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相與作中流之砥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幾何而鴻濛之世，其不一且變而爲公平正直之世也。幾何而陵谷興廢之世，其不一且變而爲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賢不詐愚，勇不害怯之世也？

這種「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想望，激動了千萬農民。一八五〇年金田鄭起義後，集合了農民群眾在革命實踐中的智慧，更把這種想望表現在一種帶着空想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制度的理想中間。太平天國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一八五三年頒佈）寫出了這理想。

天朝田畝制度詳密地規定了「分田」的辦法，把所有耕地按照產額之多寡分爲九等，平均分配與全體農民（不論男女）。除耕地外，每家均須栽桑養蠶，畜「母雞五，母牛二」。而一切生產品除供自己需用外，均須交於國庫

，不得私有。一切婚娶生養，都由「國庫」按一樣的标准與以津貼。——這樣的制度所要達到的目的，照原文中所說是：

「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他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皇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均勻，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由此可見，太平天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包含着土地國有，財產歸公，每一個農家都在平等地位上過自食其力的平均的生活等等內容。這種思想一方面表現着中國廣大農民反抗封建壓迫的鬥爭，另一方面又表現着以個體的小生產爲基礎的農民中的落後的平均主義思想。

農民們把他們的國家叫做太平天國是很有意義的。他們不可能設想在現實社會中發展新的生產力以建立新的國家，他們只能借「天」的旨意而幻想把他們的個體小生產單位組織成一個沒有剝削與壓迫的平等自由的新社會，他們企圖把他們所想像的天上的國家，搬到地下來代替封建地主階級所統治的國家。

這樣的思想當然不可能實現。事實上，天朝田畝制度也並沒有能在太平天國勢力下的各個地區內實行。但是這種思想却成爲當時一代農民開平的發動力，這種思想把上百萬企圖翻身的農民，組織成了有嚴密紀律，有組織，有決心的太平軍，進行了十多年的激烈戰爭——雖然最後是在地主階級與外國資產階級的聯合武力下被鎮壓下去了。

太平天國的思想的偉大歷史意義是在這裏：牠是把兩千多年來在封建時代的被壓迫農民的鬥爭要求提高到了單純農民戰爭所能到達的最高思想水平，而且這種思想轉化成爲廣大群眾的鬥爭，給了封建社會以最嚴重的致命打擊。另一方面，太平天國的思想啓發了廣大農民，掃除舊的封建統治者，不是爲了給新的統治者以地盤；一個無饑餓、無貧窮、無壓迫的新社會的朦朧理想，永遠在農民面前閃爍着。太平天國給了預約，却不能實現。新的時代展開了，從新時代的人民鬥爭中終於要產生新的思想，在現實基礎上引導農民前進。

二 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的

改良主義思想

一 洋務思想與改良思想

太平天國經過十五年的戰爭後失敗了。封建統治集團

向帝國主義侵略者作了全盤妥協，換取他們的幫助而才能壓倒了農民革命。在革命的風暴過去後，滿清官僚們開始了「洋務」的學習。他們設立外交機關，請外國公使入北京，學習外國公使指定與他們學會的外交規則，以便順從帝國主義者給中國安排好的地位。他們又接受外國人建議，買槍砲兵艦，辦兵工廠，來使自己在帝國主義者看來是值得支持的中國統治者。在太平天國中有了直接和外國軍隊合作「剿匪」經驗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就是所謂「洋務」的推動者。

把這種洋務運動看做是近代中國民族的自我覺醒運動的一頁是完全錯誤的。因爲這實際是封建的官僚統治集團爭取買辦化的一個運動。官僚統治集團企圖在買辦化的過程中建立穩定的秩序，却完全失敗了。底層的人民大眾的騷動不安仍然在繼續着，而中國一步步走向殖民地化的危機時時提醒着人民，連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層中也有一部分人不能不預感到這漩下去將有可怕的結果。

在這種情形下，從地主士大夫中漸漸分化出一種反對派的思想。他們多半可說是地主階級中未當權的人物，受時勢發展的刺激而對於當權的官僚集團的洋務運動感到不滿，感到有比提倡「洋務」更進一步的革新。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希望着使已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前途。

自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失敗後二十年間，是曾、左、

李等官僚集團辦洋務最得意的時期。但在二一八七二年曾國藩死後，西方各帝國主義國家與新興的日本對中國的欺凌與侵略日益加緊，以「洋務」自誇的統治集團又感到左支右絀，這時從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改良主義思想已在萌芽。到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之戰後，改良主義聲勢漸壯，又經一八九四年的中日之戰，洋務運動完全破產，改良主義的思想便在康梁的變法維新運動中到達了他的最高點。

但這種分化畢竟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絕不可能到達反對封建統治秩序的立場。最早的改良主義思想者，王韜、容闈雖曾一度去接近並企圖參與太平天國的農民政權，但他們立即發覺他們和革命的農民之間的差別，他們都很快設法在自己身上洗淨了參與農民「叛亂」的「罪惡」，轉而投效曾、李之類的官僚，寧願在封建地主集團中保持反對派的思想。

但如果不分別曾李的洋務思想與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也是不對的。前者是主動的，是在策劃了農民革命後繼續起着阻止歷史進步的作用。後者則在一定意義上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因為當時農民革命思想既已在農階的殺戮下一時衰歇下去，而現代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還沒有存在。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的改良主義思想固然還不能接觸封建社會中的基本問題像太平天國的農民羣衆那

樣，更不能預見無產階級的將來，但他們在那時候，確是不自覺地爲剛在萌芽的城市工商業者做了代言人。

二 甲午戰前的改良主義思想

這樣的反對派是非常弱的，他們對封建統治集團所提倡的洋務是不完全贊同的，但不敢予以批評，而只敢給以補充；他們在實際政治上，又往往還是依附於辦洋務的大臣，他們只是在思想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最重要的是這兩點：

第一，辦洋務的大臣們都是把洋務建設集中在官僚資本的勢力下，但改良主義者則主張鼓勵和發展民間的自由企業。

第二，單純的洋務思想決不涉及政治問題，而改良主義者則提出了（雖然是畏怯地）政治問題來，在政治上要求改良。

根據這兩個標準，我們可以把改良主義思想從單純的「洋務」思想中區分出來。

首先可以提到薛福成。薛氏隸身於曾國藩和李鴻章門下，他的思想基本上屬於洋務運動者，但在二一八七九年所著的「籌洋務議」一書，多少表現着改良主義的氣味。他提出發揚民間的工商業爲富強之本。他特別提到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認爲「官本較多，萬一稍有蹉跌，

其勢雖圖再舉，「婉轉地說出官僚資本控制企業的危险」。

他主張不妨讓商人自由經營航業。「商人有能租運輪船一二號或十餘號或數十號者，均聽其報名於官，自成一局」。此外，他又注意到紡織工業的發展，主張政府應採獎勵的政策。「竊謂經始之初，有能招商股自設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權，課其效而加之優獎，創辦三年之內，酌減稅額，以示招徠。……」

在「籌洋芻蕘」讀書中，薛福成以「變法」一章作總結，但所舉出的「變」的內容却還沒有跳出洋務運動的窠臼。（所列舉的事項是：商政職務，工藝製造，車船電報，兵制陣法，國際條約等）比起稍後一點改良主義的論調是遜色的。

馬建忠在見解與主張上比薛福成又進了一步。少年時在上海已學會外國文字，一八七六年到法國讀書。他對西方政治文化的認識在當時要算是最先進的。一八七七年他曾如此說明他的認識的發展過程：

「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圖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盡善盡美則不如無善之

善為不勝也。美之有君主，又有上下兩院，似乎政皆由此。不知君主徒事發押，上下兩院徒記空談，而政操操之實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樞密則以議院為藉口。美之取國（總統）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在遠國舉之時，賄賂公行。更一範圍，則更一番人物，見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更其治得乎？法為民主之國，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為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點耶爾者，苟非族類而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延擢乎其難也。……」（適可齋記言卷二）

可見馬建忠當時不但已看到單邊整甲利兵，其實是舍本逐末，而且還看出西方各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的虛偽面目。固然他看得十分淺，比之辦「洋務」的官僚已不知高過若干倍了。

但馬建忠的出洋和回國任事都是依托着李鴻章之類的洋務官僚，他不敢提出什麼政治主張。一八九〇年他作「富民說」，認為要使國「強」必先使「民」能「富」，并提出具體辦法三端：（一）發展絲茶等土貨生產（改良技術，合併大資本，減輕厘稅）。（二）建立紡紗織布等工業以「仿造外洋之貨」。（三）開礦。總之他的主張就是以發展生產來求「民富」，以「民富」來達到「國強」。這樣的主張和洋務運動者以「洋務」來發展官僚資本的做法是相反的。馬建忠反對官僚資本而主張發展民間資本；

「略仿西國設一商務衙門，……由商務衙門向外洋各國貸款二千萬。……然後由商務衙門將前二項所舉諸大事，若金融、若稅務、若警察，先易後難，次第分辦。其辦理之法須以商人利便設立公司為根本，取具股資資本保結，而後以借款相繼，歲取其息以還借款。……」（同上卷一）

這時獨立的民族工業還幾乎不存在，只有官辦的，官督商辦的，和官商合辦的若干新式企業。馬建忠的主張正是代表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最初期望。但在他的主張中也已顯示着自由資產階級的軟弱與無自信，除了直接由官僚統治者，間接由外國帝國主義來借款以外，不能設想自力更生的發展前途。

正因為馬建忠抱着這樣的思想，在官僚集團中終究不能「得意」。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發生時，他自怨自艾地說：「近復為世詬忌，填斥家居。」（同上卷四）

馬建忠這樣的主張在當時漸漸地在國內得到很多的同情者。像王韜、鄭觀應、嚴復、陳虬、宋育仁、陳熾都

有類似的見解。

陳熾在中日之戰前所著「庸書」中說：「今之言洋務者動曰：講求公法，整頓海防，製器練兵，聯船造廠，自以為當務之急，而不知皆緩途也。自以為得氣之先，而不知皆後者也。」（庸書外篇卷上）。

這很明白的，是針對辦洋務的官僚統治集團們說的。陳熾和別的上舉各人均與馬建忠一樣，以為辦「洋務」的根本是在發展工商業。而且他們更比馬建忠進一步，提出了政治上的改良主張。他們提出建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的主張。例如：

『欲行公法，莫要於限國勢；欲限國勢，莫要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於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於設議院。……蓋五大洲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篇）

『泰西富強之道，在有議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陳虬）

『泰西議院之法，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英美各邦所以強兵富國縱橫四海之根源也。』（陳熾，庸書外篇卷下）

他們都主張行選舉制度，設立議院，以改變專制主義的政治；但同時強調，「選舉雖曰從衆」，但如果不是「有財產身家，善讀書，負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舉議員」（鄭觀應），并且指明設立議院的目的無非是讓「紳商董事」經過「泰西投標公舉之法」以成立議院，得有議事開政之權（陳熾）。這就表明他們終究不過是地主階級中改

良主義的反對派，由他們來軟弱地表達了資產階級要求政治地位的願望。

三 戊戌維新運動

甲午之戰（一八九四年）暴露了官僚統治集團的洋務運動的慘敗。改良主義的反對派更加振振有辭了。

康有爲在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之後，已接受改良主義的思想。甲午戰敗時，他在北京組織一千多個應考舉人聯名作「公車上書」，是第一次把改良主義思想轉化爲政治運動。到了一八九八年，他居然和他的若干政府官員、地方紳士與士大夫中的同道者說動了光緒皇帝，假皇帝之力來實行「維新」。

在維新運動中的康有爲、梁啟超等人的思想並沒有很多超過甲午戰前若干年間改良主義者的主張和宣傳的內容。雖然在百日維新失敗後梁啟超將統治集團視爲大逆不道，但他們的思想始終只是保持着封建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立場。

就一方面說，一八九八年的維新運動比甲午戰前的改良派是進了一步，因爲後者在實際政治中只能依附於官僚統治集團，極端地提出他們的改良思想。前者却已不滿足於這樣卑微的存在狀態，進而企圖取得政權力量來大行其志。

但就另一方面說，維新運動恰恰表現了改良主義思想的軟弱性。他們終究只能幻想依靠封建統治集團中的最高皇權來取得政權力量，他們充其量只能把他們的理想變成一條條的「上諭」——如在百日維新時所作的那樣，其結果只得到一堆廢紙而已。

戊戌維新是改良主義思想發展到了最高點，牠的失敗也就暴露了地主階級中的反對派的改良主義的破產。戊戌維新的失敗爲這種改良主義思想的歷史進步性敲起了喪鐘。因爲在這以前，中國還沒有獨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時候，這種改良主義思想是表現着地主階級中一部分力量向資產階級轉化的理想。在這以後，雖然仍沒有堅強的新型的革命階級，但是各國主義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對中國的統治與侵略空前加緊，民族的危機空前迫切，這種形勢造成了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下層貧民中的革命浪潮，——地主階級中的改良主義也就潛潛地改變了牠的意義，不是向統治集團要求進步，而是在革命前面以改良主義面目來保存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了。這也就是說，他們已從官僚統治集團的反對派變而爲人民革命力量的反對派，於是他們的歷史進步性也就斷絕了。（關於戊戌維新的思想及其後來的轉爲行動，參看拙著「戊戌維新與康有爲」及「辛亥革命前的梁啟超」二文，見「讀書與出版」一九四八年一月號至四月號）

三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領導下的革命思想

一 從改良主義中分化出了革命主義

戊戌維新的失敗既已宣佈了改良主義的破產，而跟着「一九〇〇年（戊戌後二年）發生「八國聯軍」之役，時局的激烈變化和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更不能不在思想界中引起巨大反響。

梁啟超在一九〇一年曾指出：「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點之一刹那間實中國兩異性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陳嬗代之時」。梁氏的這說法很足以表現他識見的敏銳，但他還不能夠具體看出，隨着二十世紀降臨而在中國「新」起的力量就是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

梁氏又有一段話大致說出那些年來時代思潮發展的梗概：「二十年前，開西學而驟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驟西學而驟變法矣。十年以前開變法而驟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驟變法而驟民權矣。一二年前開民權而驟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驟民權而驟革命矣。」這段話是在一九〇二年說的。這就是說，自經一八八四年（「二十年前」）的中法之戰後，洋務運動的「西學」思想已只是陳辭濫調，而有改良主義的變法思想；到

了一八九四年（「十年前」）的中日之戰後，「變法」思想漸漸失去新鮮的力量，而有「民權」思想漸漸興起；及至一九〇〇年（「一二十年前」）的「八國聯軍」之役後，思想界又漸漸發生革命的思潮了。（這裏所說的「民權」自然只是梁啟超所了解的與革命相分離的「民權」。）

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把思想領導權從地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手裏奪取過來。他們在社會經濟上的弱點也深刻地反映在他們的思想上面。

第一、在帝國主義商品傾銷與官僚資本的壟佔一切的雙重壓迫下，民族工商業本已絕難得到抬頭機會；自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又直接投資中國，辦廠開礦；八國聯軍之役後，更形成列強共管中國的形勢。新興然而軟弱的工商業資產階級處此形勢下，被迫地有了初步的政治覺悟。但他們並沒有充分的自信與力量以開展自己的前途。大量的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多半出身於沒落的地主家庭中，受時勢的刺激，奔趕到資產階級的革命理想下來，但他們的思想往往充滿着動搖，波動與混亂，並不可能立刻建立明確的革命思想。

第二、因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開始時倒是和改良主義的維新思想打成一片的。如同維新思想從洋務思想中分化出來的一樣，這時期的革命思想也是從維新思想中分化出來的。孫中山在一八九四年上書李鴻章，

完全是改良主義者的論調，一八九五年成立興中會謀在廣州起義，雖已初步地提出民權思想，并強調反滿清的民族革命主張，但這時所提出的民權思想只是朦朧地撞着一種歐美式的「合衆政府」（共和政府）。一八九八年廢梁失敗出國，與孫中山革命派同在日本，後者還企圖成立合作，並不覺得雙方間有思想原則上的區別。這時，康梁甚至也被視為革命人物。一九〇〇年後，國內各大城市與海外華僑中愛國運動與愛國團體風起雲湧，滿清當局公開做帝國主義代理人，壓制愛國運動，這種情形本極有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但革命派並沒有能利用這時機建立思想上的領導。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思想上的堅決分裂與對立，到了「一九〇五年」才開始公開顯露。

第三、相反的，在改良派方面倒能够敏捷地利用一九〇〇年後的廣大羣衆心理浮動的時候，再建他們的道德陣地。梁啟超不愧為中國改良主義者中的最傑出的人才，他既敏銳地看出時代思潮的推移，在一九〇〇年後，他就不再專彈保皇維新變法的老調，而把自己裝成是個民權論者，革命論者。民權是他自戊戌時已經談到的，但他所謂民權其實乃是給地方紳士以權力；而他所謂革命，却是并不要徹底推翻現行統治秩序，而讓地主紳士來用和平合法手段「革命」。正因為革命派思想「陣營」薄弱，所以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間，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風靡

一時，他適應時勢而作的激烈論調客觀上固然也起了提高羣衆覺悟的作用，但其在巧妙化裝下傳播非革命的改良主張，却也一時地達到了使革命的思想陣營混淆與削弱的效果。

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却在不斷地暴露着改良主義的破產，并暴露着假革命論的虛妄。事實證明，在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滿清政府反動統治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想望，如果要真正實現，那怕只是實現一點，也只能用革命方法，不可能用任何和平、合法要求來取得。

客觀形勢的發展推進着人們的思想認識，不能不越出改良主義所劃定的藩籬，而走向革命的水平。

這裏只舉一個例來表明自戊戌維新失敗後小資產階級知識商人中革命思想的醞釀。

一九〇〇年東京留學生中出現一篇署名「是中國人」的文章，駁斥張之洞的「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其中說：

「……總之人人有自主之權，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極點，無可奪者也。……至若不受限制，甘心流血，因捨身救民之志士之所為，各國歷史數見不鮮者矣。試取英國之史觀之，一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如何，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如何，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如何，使英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英民猶君主貴族之奴隸也。取法國之史

觀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革命又何如，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又何如，使法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法民亦君主貴族之奴隸也。又取美國之史觀之，英之所以壓制美國者何若，美之所以抵抗英人者又何若。使美人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美國獨印度也。取意大利之史觀之，各邦之君所以治其內者何若，法奧諸國所以制其外者又何若，使意大利甘心壓制而不流血，則今日之意大利亦其也。近世西儒有恒言曰，列國之文明皆從流血而來。……今日中國方諸英法革命以前，美意受制之日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蓋為埃及印度土耳其之日久矣！……」

戊戌維新時，康有為開口彼得大帝的新政，閉口明治維新，但現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已經進一步開始憧憬於英、法、美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了。

二 「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

到了、一九〇五年，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思想遭受了從革命派方面來的決定性的打擊。革命派取得了思想領導權。其時在客觀形勢上有幾點值得注意。一、由於反對美國對待華工的帝國主義政策，中國沿海各埠商人發動抵制美貨運動，這表示工商業者的自覺性提高了。二、在一九〇五年前，除了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外，國內各地有華興會、日知會、光復會等組織興起，在其思想與行動上都已遠

超過康梁主張。到了一九〇五年七月，這些組織結合起來，在孫中山的思想領導下合組成同盟會。三、滿清統治集團自戊戌後本以為康梁是一切「叛亂份子」中的巨魁，但漸漸發現了康梁以外的革命派勢力才是他的真正敵人。為了從革命危機中挽救自己，滿清政府於一九〇五年宣佈預備立憲。

同盟會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在日本成立，十月廿一日其機關刊物「民報」創刊。這時滿清政府預備立憲的佈置已經在進行起來了。康梁思想直接影響下的海內外的改良主義者都歡呼雀躍，以為所要求的漸可實現。從種族感情出發的單純排滿革命論者在這時甚至有十分悲觀的，他們害怕滿清如實行君主立憲，反滿革命將永難告成了。在這情形下，如果不能建立明確的革命思想，和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派嚴格區分開來，革命派的陣營勢將無法繼續前進。孫中山在這時提出了三民主義的思想，正是適應了這個客觀需要。他在同盟會綱領中提出「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在「民報」發刊中又第一次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提了出來。同時「民報」中就開始了對梁啟超思想的正面進攻。於是在「民報」與「新民叢報」之間形成了一次綿延三四年之久的大論戰。一九〇六年在上海曾有著名壁上客的人編輯雙方論戰之最初幾篇文字成一書，題目就叫「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

梁啟超之談民權，談革命，本只是爲了達到實行君主立憲的目的。現在滿清政府既已承認立憲，而革命派却當真地非實行民主革命不可，這時梁啟超不能不暴露出保皇改良主義的真面目，他是支持滿清而反對革命的。在這次論戰中，他一直寫到，「論中國萬不能引共和制之理由，」（見新民叢報七十五期）這樣的題目，他的失敗是註定了的。——粉碎了君主立憲派的迴避革命的幻想，正是革命派在這次思想論戰的重大成就。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派通過這次論戰而站定了腳跟。他們把民主立憲的思想和反滿清的鬥爭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樣使得在進入鬥爭的群眾面前有了值得爲之獻身的明確方針。推翻滿清後，必須也只能建立民主共和的政體，從此成爲公認的必然規律。孫中山在一九〇六年爲慶祝民報一週年而作的演講中說：「我們推倒滿清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牠分作兩次去做。政治革命的結果，一定要建立民主立憲的政體。照現在的政治說起來，便是漢人爲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所以我們定案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的革命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萬不可少的。」

然而革命派在這次論戰中表現出的弱點也是很顯著的。梁啟超極能抓住這些弱點進行反攻，如果不是因爲他在

基本上已轉向反動立場，他的有些反攻是很能給對方以致命傷的。

革命派雖然以反專制主義和反滿清結合，但終究說不出狹窄的排滿觀念，甚至發展爲大漢族主義思想。例如「民報」第二號中提倡以漢族爲主來「同化」國內其他各族。「必以我民族居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於他族可也。……今當執民族主義以對滿洲，滿洲既夷，蒙古隨而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當時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思想又絕不包含反帝國主義的內容。梁啟超以革命必召瓜分之說來責難革命派；革命派固然能辯嚴義正地指出，中國的危機並非產生於革命，而正是由反動專制統治者所招致，但他們自己又跌入帝國主義列強會尊重和支持中國革命的幻想中。康梁改良派以爲，列強不喜歡中國人民「造反」，但如中國以和平方式行立憲而求富強，列強就會好意地扶持中國，而革命派却以爲，只要中國人民起來革命，列強就會一變過去侵略態度，改顏相向。——在這點上，立憲派與革命派實際上是一百步與五十步之差，犯了同樣的錯誤。

民報第四期上提出民主革命思想的概括說明，其言曰：「吾之目的欲我民族的國民創立民權立憲政體（普通謂之民主立憲政體）者也，故非政治革命種族革命不能達其目的。（各國革命有君主立憲而後者，而我國今日爲異

族專制，故仍不能望君主立憲。唯有民權乃能革命，惟革命乃能民權立憲。」提出這樣的論調來推舉保皇改良主義，固然極有力量，但其漏洞已可看出。照這樣說來，如果不是民族專制，「革命」也未嘗不可以「至君主立憲而止」了。這樣的思想正預兆着辛亥革命的前途。

而且當時的革命派在民主思想上還有一最大弱點。他們不從中國民主革命的實際形勢出發來討論問題，却只是憧憬歐美各國的議會政治的形式，搬弄着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法理學」家的「理論」來做言論根據。他們既不懂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將來是農民大眾，也不懂得徹底的民主革命就是徹底的摧毀封建勢力。他們以為問題不過在預先設計好一整套的民主立憲政府的制度，至於革命過程只是極簡單的事情。民報第四號上甚至說，只要提倡了民族主義，國民主義（民權主義），會國藩胡林翼這樣的人物也可以參加革命。「如此二主義而昌明也，則會胡之在今日，吾可決其為革命軍中之一人也。」則反對革命者只滿洲人與其死黨，不足以當一碎。然則革命之時日不必甚長，一方扶義，萬里響應，合謀分舉，指顧而定。「這種期且快意的說法正反映了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軟弱，他們多麼盼望革命時期迅速過去，好很快產生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安定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大論戰中還牽涉到社會主義。

孫中山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把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主張，幻想用他的「民生主義」來解決社會主義問題，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的發展。梁啟超在民族、民權問題上敗下陣來，便從社會革命問題上大肆反攻，詆為「因不徹的民主主義」（新民從報八十六號）。這種評語未嘗沒有道理，但是孫中山當時的三民主義在許多難湊的內容中仍有一點是值得重視的，即他敢於接觸土地問題。梁啟超之所以對其實並無社會主義內容的「社會革命」論大為憤怒，甚至說：「敢有言以社會革命（即土地國有制）……與他種革命同時并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就因為革命派的這種言論，如果發展下去，見於實踐，勢必觸犯到地主階級的傳統封建利益。但是站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立場上的革命派其實只能模模糊糊地接觸一下這個問題，他們把最實際的反封建的問題理解成是預防資本主義社會衝突的「社會革命」問題，他們把十九世紀歐美資產階級的庸俗的社會改良政策抄襲來，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想把他操和到民主革命中，以求「畢其功於一役」。其結果只不過是少數知識份子的空談，並不能領導起廣大人民來從事反封建的鬥爭。——當時這種對於政治改革與社會革命的混亂見解流傳下來，以致到現在還有人糾纏在這些糊塗概念中摸不著頭腦。